

王愿坚短篇小说中的符号、叙事与文化认同建构

□安孟瑶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大都取材于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的战斗历程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鲜活灵动,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也因其平易的文风和深刻的内蕴,多次入选全国各地中小学教材。(如:《七根火柴》,被选入上海两期课改新教材语文七年级教材;《草》,被选入苏教版语文八年级教材;《三人行》,被选入冀教版语文六年级教材;《灯光》,被选入人教版语文六年级教材和北师大版语文五年级教材)王愿坚也因其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作家。

笔者拟通过对王愿坚短篇小说创作中相关符号意象的使用、叙事逻辑的建构入手,分析其如何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叙事手法实现对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

王愿坚是解放以后才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主要来自于他对革命战争亲历者的访谈,以第三人称为主,从党费、火柴、草、灯光等简单的意象入手,刻画的是基层红军战士和革命根据地普通百姓的战斗与生活细节。

《党费》一文塑造的“黄家阿嫂”这一人物,是革命战争之中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家庭的缩影,在当时极度缺盐的情况下,她带着孩子在贫苦的生活中煎熬,却能组织地方妇女凑出几坛咸菜作为特殊的党费交给组织,甚至为了掩护素不相识的共产党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七根火柴》亦是,身负重伤的战士在临终前留下最后一笔“遗产”竟然是七根小小的火柴,而这七根火柴对于当时长征途中物资极度匮乏的红军队伍而言更是意义重大。《草》一文同样从一根不知名的野菜入手,讲述了犹在病中的周恩来不顾一切,为确保红军队伍的饮食安全以身试毒的故事。《路标》《灯光》《三人行》《普通劳动者》等短篇小说作品亦有此特点,都是以一个简单的意象符号作为贯穿全文脉络的线索,串起整个情节发展的过程。这些符号的意义也不仅仅限于其含义本身,而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战争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缩影。

无论是“党费”、“火柴”还是“赶队”、“灯光”,在战争年代时局动荡、物资匮乏的大背景下,都反映了红军战士和当时革命根据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普通群众最切身的生活实际和最热忱的信仰。几筐咸菜、几根火柴、一束光、一棵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符号却有着最深的战争文化的烙印,也同样传递着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队伍的号召力、影响力,传递着当时的中国人民和共产党员、战士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



七根火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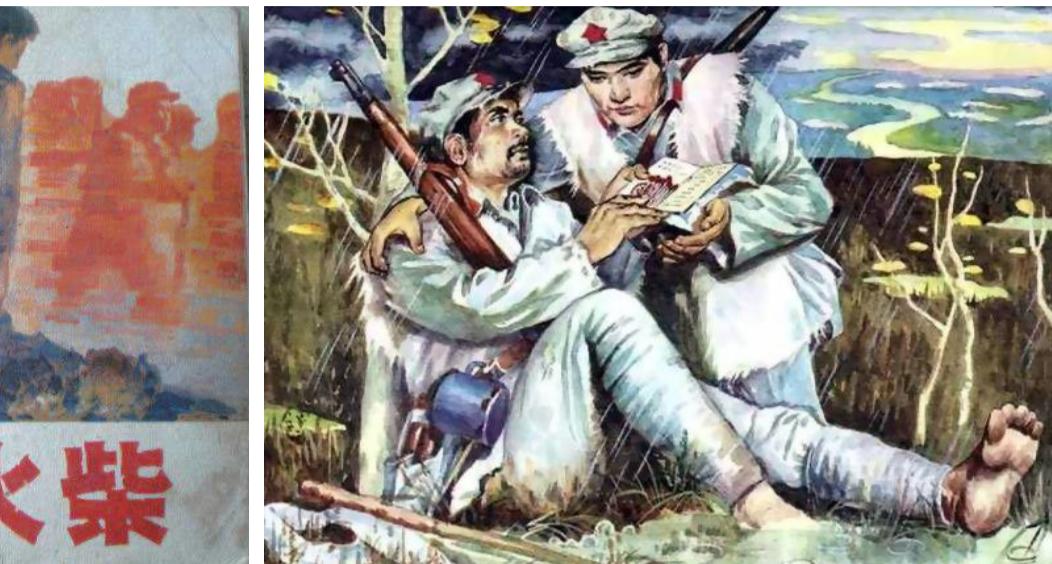
精神的捍卫。

各类文化符号元素的传承是一个民族实现族群文化维系、传承和教育功能的重要方式,这些符号不但具有基本的表意和释义功能,同时也能够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意志,反映出一个群体所共同认可的认知符号。作者在写作和叙述过程中所使用的特殊方式,也就是由身边处处可见,看似不足为奇的文化符号入手,这些符号取材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和看似平凡的人物,能够最快地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不仅能够起到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作用,更能反映出战争年代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取得民族解放而不屈不挠、不畏艰苦的战斗力量和民族精神。能够以小见大,在平凡中更有耐人寻味的深意,也为读者留下更多深入思考的余地。

二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创作在运用文化符号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小”叙事的方式。在革命战争这样一个极具年代感和极具历史意义的宏大背景之下,所表现的题材又是英雄大义、民族精神、党的领导者在革命历程中发挥重要的引领和表率作用等等宏大的主题,如果选择宏大叙事的方式,则难免落于歌功颂德、大而空洞之窠臼。“小”叙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而能够起到见微知著、拉近读者情感距离的作用。

在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历史背景长篇大论的交代和描绘,也极难看到作者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歌颂和褒扬。在其整个的叙事结构和情节走向中,年代感和当时



的战争背景虽然贯穿其中作为重要的线索和背景,但是从总体的逻辑安排来看,是退后到了背景的位置,作为隐性的条件出现的。相反,作者用更重的笔墨所表现的是对当时某些人的言行举止的刻画,比如普通的红军战士、指导员、通讯员、群众等,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走向,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也无法决定整个中华民族的最终命运,但是每个人所表现出的虔诚的信仰和坚毅的革命精神,都预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究竟归属于何处。

以《七根火柴》为例,红军长征过程异常艰难困苦,无数红军战士倒在了雪山草地之中,为夺取革命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七根火柴》中看似写卢进勇,实际真正的主角却是那位不幸牺牲的不知名的战士。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从对环境寒冷的交代到战士拿出火柴的场景刻画,再到燃起篝火的描绘,都贯穿着这七根宝贵的火柴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些火柴是“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甚至连火柴的数目,都倾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绘:战士临终前一根一根艰难数清的过程,七根火柴,不多不少。恰恰是这种从小处入手的独特叙事结构使得其有血有肉,让这种战斗精神和革命意志更鲜活生动,也更能深入人心。这七根火柴或许只能照亮长征途中红军队伍的一隅,只能燃起有限的篝火供他们取暖,但是这七根火柴背后,也同样折射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战斗到底的毅力,这才恰恰是取胜的关键。

王愿坚在短篇小说创作中频繁使用的生活

化叙事手法是一种从小处、微末之处入手的叙事方式,反而能营造出更富画面感的效果,将作者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判断蕴含在人物的行为和语言之中。生活化的叙事并非对宏大主题的忽略和漠视,而是在将战争与年代背景整体后置之后,采用另一种叙事手法将年代背景中蕴含的宏大主题进行更深刻的描绘。

三

从王愿坚短篇小说创作的符号建构特点和生活化叙事的独特写作方式之中亦不难发现,其看似平淡的内容背后,往往蕴含着对于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刻理解。

“认同”这一概念最初应用于哲学和心理学中,后来应用于社会学中的研究并发生了意义的转换。弗洛伊德指出:“认同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在个体层面,认同是指个人对社会的自我身份的理性确认,是个体社会行为的持久动力;在社会层面,认同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自己所属群体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与分享。”

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都是整个国家和民族范围内的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确认,不论地位高低、社会角色如何,他们都分享着同样含义的信仰与情感。尤其是王愿坚作品所描绘的革命战争年代,其刻画的主体涵盖了当时社会中不同的群体,从人民群众到普通的红军战士乃至将军、党的革命领袖,这些不同的主体看似身处不同的地位,在革命队伍中担当着完全不同的角色,但实际上都是认同的主体,也正是这千千

万万不同的主体共同构成了当时的民族文化与精神信仰。

认同的构建离不开认知、情感和价值标准的共同作用。尤其是在当时战争年代的背景之下,通过对生活化符号的应用、对基层战士和群众生活状况、心理状态的刻画,更能真切地反映出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之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这种号召力、影响力并非来自简单的说教或是如国民党般残酷镇压下对民意的强迫,而是来自对国家和民族身份的崇敬与热爱。

正因有了这样的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党费》中的黄家阿嫂才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惜丢下年幼的孩子,也要掩护共产党同志,以保证组织工作的正常进行;《普通劳动者》中的老将军才会在战争后的建设中回到战士的队伍里,与最普通的战士共同参加劳动,年轻的小战士面对这样的“新战友”,也一样诚恳热情,老将军对当年激战的回忆和对年轻小战士的慈爱,蕴涵着对国家的热爱,对国家和民族后继有人的欣慰与感动。也正因有了这样的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草》中所记录的周恩来才会在自己已经身患重病的时刻,仍然不顾个人的安危去替战士们品尝有毒的野菜,以避免发生更大规模的中毒事件,作者在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个体进行描绘时,并未因其身份地位高低而造成任何差距,采取一视同仁的平淡而真挚的笔触,反而刻画出了当时的社会中不同的群体一心为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统一所作出的贡献。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使用了诸多质朴平易的文化符号,在叙事过程中也将宏大的战争和革命历史作背景化、淡化处理,突出讲述风云激荡的战争历程中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讲述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在无形之中将战争年代共产党革命队伍中凝聚的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力量蕴含其中,并通过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使得这种认同感在文学作品中进一步强化并延续下来。

时至今日,即使战争年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些令人震撼的故事仍然能够以这样一种平实深刻的姿态存留在文学史上,仍然能够走进教材,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孩子们受到触动,让他们看到革命前辈艰苦奋斗和顽强拼搏的历程,看到无数革命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坚持革命的刚毅精神。作为一个中国人,身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与认同感,都是这些故事不断流传的意义,战争历程中每一位曾作出贡献的“战士”留下的不朽英魂,在这些作品中也永存鼓舞人心的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王愿坚曾说过:“过去了的,并不只属于过去,它还属于现在和将来。”《小游击队员》出版至今,书中的少儿英雄形象及他们的爱国情怀向我们彰显了“红色经典”的深刻教育价值。

优秀的短篇小说,不光有优秀的故事情节,还要有生动的人物形象,王愿坚的短篇小说集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通过这些典型的人物形象让我们了解了革命先辈们,了解了他们的理想和信念。但深深印在笔者脑海中的是作者塑造的那些少年英雄们,他们勇敢、机智、坚强、富有力量。

《小游击队员》中的樟伢子,大约有十二三岁,又黑又瘦的小脸上,嵌着一个尖尖的翘鼻子,头发有二寸来长,乱蓬蓬的,像个喜鹊巢。浓浓的眉毛下边摆着一对大眼睛,乌黑的眼珠,像算盘珠儿似的滴溜溜乱转。这简括有力的两句话描绘了人物特征,勾勒出樟伢子的面貌。语言精练,但却能让读者一目了然的看清人物,读懂人物机灵的性格。再如《赶队》里的小何,一个十五六岁的小鬼,小小的一张圆脸,尖下巴,长长的睫毛下面有着一对大眼睛,短短的头发上,歪歪地扣着一顶洗白了的八角帽。这段描写使读者无法

分辨这是一个男孩还是女孩,但接下来读者的那句“如果不是帽舌下那一绺头发,我还以为她是个男孩子哩!”这句话直接了当地说明小何是个女孩子。语言平实,线条清晰。另外,人物的肖像描写还可以以形写神,来表现人物的品质性格,如:《后代》中的黄承谋同志,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二十六七岁,高个子,宽肩膀,大大的四方脸上嵌着一双乌亮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精力旺盛、意志坚强的人。其实,写外貌是为了表现性格,揭示其精神世界。由此可见王愿坚儿童小说作品对外貌的描写并不求多,而在于“精”,以小见大。鲁迅曾说过:“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出他的眼睛……倘若画出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的逼真,也毫无意思。”故王愿坚的这三段“省俭”的肖像描写,不仅将人物外貌描写出来,还准确生动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充满朝气活力。尤其是三人那乌黑乌亮的大眼睛,给人一种炯炯有神的精神面貌。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通过对眼睛的描写,再次表现出这些英雄少年们的勇敢、独立。所谓的肖像描写中的画眼法也无非就是通过人物的眼睛来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人物的性格的一种常见的写人的方法。毕竟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和内心活动都是通过眼睛表现出来的。

在王愿坚的这几篇少儿英雄小说中除了优秀的肖像描写外,还非常注重细节的描写,即善于截取人物性格中最美的瞬间,让人物性格中最美好的事物像火花一样迸发出来,给人以激情和力量。越是生死关头,越能展现大爱,越能体现英雄本色。樟伢子受侦察班班长黄光亭委托勘测壕沟的情况,不幸被敌人发现,班长让樟伢子把情报给游击队送过去,他留下来打掩护,在估计樟伢子能钻进山洞后,又打倒一个扑上来的鬼子后,班长突然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班长这么做是出于两方面的考量,其一情报大于个人性命;其二不想让自己成为敌人获取信息的突破口。这个对准自己太阳穴的瞬间一下子扎到了读者的心尖上,让人捏了一把汗的同时也由衷的让人佩服。

王愿坚在《美的战争历史和美的军事文学》一文中说道:“文学是最讲单位面积产量的,就看你能不能在最小的面积上,惊人的容纳和表现出尽可能多的美的思

想感情。”所以在王愿坚的这几篇短篇小说中,除了精致的人物描写、细节描写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短”。小说的篇幅只有几千字,就是这几千字将人物刻画的如此精致,细节描写十分到位,将人性的瞬间展示得淋漓尽致。正如作者所说:“短篇之短,短在篇幅上,却绝不能短在见识上……有点真知,有点见地的,虽短而有点生命。”(《见得高,知得深》)

二

茅盾曾说过:“人是时代舞台的主角,写人怎样在时代中斗争,就是反映了时代。”王愿坚塑造的小说人物多为抗战英雄,每个人都心系共产党,心系革命,心系国家。他之所以会创作这些作品,一是他想记录他所看到的,所感受的,二是他想为后人留下回忆和财富。正如他在《后作》一书的后记中写的:“近几年,因为工作的关系,见到了一些老战士。我是怀着深深的敬意和强烈的激情去认识和了解他们的,他们的斗争经历是那么曲折动人,他们的精神品质是那么的美丽崇高,我觉得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铺成的,他们身上的那种崇高的思想品质,就是留给我们这一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用自己的笔墨让后人来感悟革命历程,感悟革命英雄的精神面貌。作品中的少儿英雄作为革命英雄中的后辈用行动证明了保卫国家不分年长年幼。

短篇小说集《小游击队员》是王愿坚1977年12月应北京人民出版社的邀请为少年儿童编的一本书,集内收录的是以青少年革命者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均从他之前的创作中选出。编辑的目的是向青少年读者介绍革命的过去,讲讲艰苦岁月里的孩子与革命,期盼小读者们在读了之后,又能想一想,引起一些思索,从而更加热爱那些革命前辈们,激起进一步认识和学习他们的愿望。

这是第一版以《小游击队员》命名的短篇小说集的形成,作者选出10篇放入作品集中。前三篇《夜》《肩膀》《路标》是作者在纪念解放进军50周年,为缅怀毛主席和周总理、朱委员长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编写,其余几篇所写的人物都是少年革命者,苏区的红色儿童,坚持游击战争的小战士,长征途中的小红军、少共

团员。而在1996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游击队员》里只列入了5篇,分别为王愿坚在1956年第8期《中国妇女》上发表的《赶队》;1957年1月号《作品》中发表的《后代》;1958年1月号《长江文艺》中发表的《村野的火星》;1958年人民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党费》中收录的《小游击队员》;1962年7月号《解放军文艺》发表的《征途上》。自那之后《小游击队员》的短篇小说集一直以这5篇的形式呈现。据笔者检索,出版过此书的有如下出版社:

1.北京:北京出版社,1978年7月。
2.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
3.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4年9月;2008年8月。
4.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2007年4月,维吾尔文。
5.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年8月;少年红色经典。
6.北京/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5月;中小学生课外书屋。
7.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
8.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10年。
9.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月;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

10.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

11.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出版,2013年7月;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12.青岛:青岛出版社,2013年7月;红色少儿文学经典读本。

13.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7月;红色少儿文学经典读本。

14.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

15.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16.西安:西安出版社,2017年;中小学课外书屋。

由此可见,《小游击队员》保持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笔者尝试从以下方面分析原因:

从时代变迁的角度来看,王愿坚的小说题材大多选自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和苏维埃区域的战争生活。而现如今随着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经济全

球化的发展使得各国在注重发展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国家历史文化。王愿坚的作品鲜明的时代性,人物刻画中的爱国主义情怀,成为后代人对革命传统的追求、标榜;

从国家意识形态来看,其传播得力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国家文化产业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的全过程。“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正是由于“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影响,《小游击队员》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空窗期后,于2004年重新出版,同年又入选中宣部等九部委“知识工程——中华全民读书活动”推荐书目,2005年入选文化部、财政部送书下乡工程政府采购书目,2006年列入新闻出版总署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建85周年重点图书选题,2007年列入总署纪念中国人民群众建军80周年重点图书选题。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所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以“红色经典”出版来致敬,同时也是为2009年祖国60岁诞辰提前献上诞辰礼,让生活在幸福中的当代少年儿童感受历史,学习英雄。它之所以作为红色经典是因为本书宣扬了爱国主义,契合了国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内化成少年儿童的自觉意识,于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小游击队员》一直在陆续出版;

从儿童教育的角度来说,《小游击队员》里面的作品篇幅简短,人物描写形象,细节描写深刻,这样的红色经典书籍对少年儿童的思想品格的形成、人格的健全、身心的健康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学校的老师和家长会比较愿意孩子接触这些红色经典。就少年儿童本身而言,他们都会具有英雄崇拜的心理,这些英雄在他们心中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榜样无论是外貌还是行为举止都可以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感染力、感知力,让少年儿童学会勇敢坚强,思考责任。故此书的出版无亦是培养少年儿童品格的重要载体之一。“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应该将红色经典教育和爱国主义相结合传到孩子们的心中,以书中少儿英雄的博大情怀去学习弘扬民族精神。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王愿坚儿童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与传播状况
以红色经典丛书《小游击队员》为例
□杨珊

